

新时代，我们与诗歌一起回家

□北乔



写好新时代，以诗歌的方式呈现新时代的生活纹理和精神脉络，是诗人的使命，也是诗人之所以为诗人的基本素能。诗歌回家，是我们首先要面对且亟待解决的问题。与诗歌一起回家，就是要回到内心本真，回到生活现场，要回到诗歌的新时代审美，把书写新时代的精神作为人生和诗歌的共同理想。

新诗历经百年跋涉，其实也到了蜕变或突破的关键时刻。一切的检视和展望，都是为了迈出新的步伐，深度参与新时代现实叙事的精神铸造。这是诗歌发展的必然，也是诗人行走无法绕开的历程。这涉及到当下与历史、现实与内心等诸多关系，但核心只有一个，诗当是生活本质性的体现。无论是在现实中行走，还是在高空飞翔，总无法脱离大地。习近平总书记

或只针对少数诗人而言。诗的纯真，诗的辽阔，诗的高尚，诗的无功利，这背后的诗人，在做人方面，有时恰恰相反。我们尊重艺术的特殊性，从内心到外在的诗，会经历种种的增减、变异，这不可避免。如同我们在生活中，心中所想与事实行为间常常也是无法吻合，甚至会完全背离。一个诗人与自己的诗尽可能相近，在当下是件难事。哪怕这已然是普遍性的存在，我们也不该漠视，甚至认为是理所当然。无论是诗歌理想还是流派思潮，出发点

有知行合一，心跳与脚步同频共振，诗与人同魂同体，才可能有伟大的诗和同样伟大的诗人。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感受新时代的“新”，书写出新时代的“新”，才能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无愧于诗人的职责，无愧于诗的神圣。

与诗歌一起回家，就是要回到生活现场。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文艺工作者应当“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这是新时代的使命，也是新时代诗人的使命。不了解生活，不领受新时代的气场，诗歌不可能出新。应当承认，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对现实的生活，对新时代广阔的图景，知之甚少，缺乏广度与深度的体验。新时代的话语已经全方位地参与我们的生活，而我们的诗语远远没有跟上。具体的、个人化的生活，自然是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样的体验有时被我们或多或少地屏蔽或遗忘。作为诗人，理当有清醒的体验意识。我坚信生活的积累和主动性的参与，终将激发诗情和诗性。

写好新时代，以诗歌的方式呈现新时代的生活纹理和精神脉络，是诗人的使命，也是诗人之所以为诗人的基本素能。如何坚守纯净的诗歌理想，以获得最大程度的审美之功？如何以诗的方式与现实对话，呈现复杂而多样化的生活？如何忠于现实忠于内心又为新时代绘出传神而充满力量的精神图景？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指涉生活与诗歌的互动。在我看来，诗歌回家，是我们首先要面对且亟待解决的问题。显然，这里的“家”是一个多重性的复合概念，包括诗歌的本质、诗人的本真，以及对于生活的尊重和热爱，等等。

诗人回到内心本真，其实是给诗人在提升境界和精神方面提出了要求。如果诗人自己都不能活在自己的诗里，那么诗的力量将是极为有限的，是苍白的虚弱的。文学是对现实的真切观照，诗人当是“出色的现实和灵魂捕手”。而这些首先取决于诗人自身的心灵之光，生活的态度，以及观察和思考世界的立场与方法。诗歌所传达的坚硬的风骨和高蹈的精神，源于诗人的心灵之家。写诗是与世界的对话，是向大众的表达，更是诗人向内的自我修习。汤养宗有一首诗为《去人间》，也有一部同名的诗集。他是在以诗人的名义去人间言说，唤醒沉睡。这是他的勇敢和自信所在。同时，他也觉得真正的诗人必须生活在人间，必须在人间言说诗歌。记得汤养宗曾说，“写诗，是我做得最认真的一件事”，如此，写诗是他的重要生活。当一个人真正把诗歌当成生活的重要部分，并有足够的诗歌能力，那么，他的诗歌就值得我们认真阅读。如今，我们处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新时代，诗人有责任让自己与新时代同呼吸，将生活的真实与灵魂的

我写诗之晚，晚得我自己都觉得惊讶。2017年5月20日，这在我的诗歌之路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这一天，我写下了平生的第一首诗。此前，我创作散文小说，关注文学评论，偶尔也写诗评，但从未写过诗，也一直认为自己写不了诗。2016年10月，我奉中国作协之命，到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挂职，助力脱贫攻坚。虽说我的人生和工作经历相对而言，并不简单，但临潭之行，之于我的意义还是相当丰富。我出生在农村，高中毕业后参军至武警部队，摸爬滚打了很多年，从师级单位的副团岗位转业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军旅生活的25年里，我一直在基层，在城市的郊外。经历过几次调动，当然也包括转业，一次次进入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人群。但这些基层生活和陌生状态，都远不及在临潭的三年。人到中年，一切似乎都固化了，我到临潭，看似是一粒石子投进平静的水面，其实是一粒石子砸进了我的心湖。临潭在高原，在藏区，在我的生活经验之外，当然这对许多人而言也是极为陌生之地。我回到了乡村，这与我童年体验留下的记忆乡村是完全不同的。名为

与诗歌一起回家，就是要回到内心本真。诗与诗人的关系，原本应该很简单。《毛诗大序》记载：“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南宋严羽《沧浪诗话》云：“诗者，吟咏性情也”。是的，诗与诗人当是坦诚相见，实现最大限度的统一。可惜，现实远非如此。我们在追求真诚，在真诚写诗的诗人，并不占多数。内心话语与诗中的文字，常常只是亲戚关系的，甚至是仇人关系。又如其人，许多时候恐怕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毋庸置疑，好的长诗足以承载社会和时代精神的重量与使命。我们都在用文艺讲好中国故事，讲故事的方式很多，从文上来讲，小说比散文、杂文更适合讲故事。在我个人作为一个诗人的经验里，长诗是比较适合用来讲故事的。我所谓“讲好故事”，乃是指在当代审美意绪上对故事的一种多方位的展示，乃至对故事的深度与广度的需求之满足。比如长诗的宏大的叙事架构、绵延不绝的抒情渲染、跌宕起伏的情节造势、别具一格的语言方式，更在历史性、时代性、引领性上有卓越表达，更灵活的虚实之间的转化，更自由的时空转换，更魔幻的造型体验，更真实地接近生命本身的律动，可以更感性，也可以更理性。要满足这类形形色色的要求，长诗是一个比较好的载体。

外的那些诗，至少是时代中更琐碎的，当然，不能说短诗所呈现的远在时代的核心之外。我只能认为，短诗固然是更量化的书写场域，但它们更多地诉诸一般的生活与工作、一般的环境话语，而不是有显著时代标识的书写。

新时期以来，长诗创作呈现了量上的发展。从资料上看，有不少诗人出版了长诗。但遗憾的是，知道的人并不多。我本人自1976年以来，从写白求恩的《高尚的人》开始，至今已出版了《静静的白桦林》《遵义诗笔记》《烛火之殇——李大钊诗传》《跪你一千年——写给文成公主的99首情诗》《萧萧班马鸣——萧军诗传》《落红——萧红诗传》等10余部叙事长诗。可以说，在长诗创作上有一些体会。

我以为我们的文艺要讲好中国故事，表现中国梦、抒写新时代，需要更多的长诗来参与。长诗责无旁贷，强调它的重要性，也是被这个时代本身的精神内容在不断的充实的节奏与速度中所诉求与期待的。具体有以下理由：

一、诗歌难度创作的需求与创作元素的累积对长诗的期待。

新旧交叉的时代，是最能产生大诗人的时代。在当今时代，我们的诗人需追求一种难度书写，因为单纯的灵感型书写，尽管不违背美学的意志，但我认为，网络时代文学的抒情性已然被情感宣泄所干扰、混淆，单纯的抒情性很容易与宣泄性的话语对照时，被理解为一种过滤掉尘埃的诗意，而这种诗意实际上是过度简单的，甚至本来是一种空洞的东西。这种东西很容易生产，对于我们诗歌的发展并无结构性的启示，或至少是形式上的启示，对于时代的主要精神也所涉甚少。我可以将这种简单比喻为一条鱼吐了几个水泡，就像几年前某件轰动网络的诗歌事件所批评的那种诗歌。

这种太简单的诗固然也能引人愉悦，产生美感，但是它有一个重要的缺陷：不喜欢将社会责任诉诸诗行，譬如小孩不喜欢背上沉重的责任，而只喜欢玩耍。中国正处于大变革时期，比任何时代都复杂、纠结、博弈、困惑。信息化把人们推向不可

长诗，时代精神的提纯与创新突围

□峭岩



《孔雀东南飞》之九 萧玉田作

知的“深渊”。道和主义纠缠，昨天和今天交叉，东方和西方较量，对和错、美和丑、假和真、荣和辱混杂在一起，单一化的审美形态或已难以描绘出整个时代的能指范畴。正是这种复杂性、多向性、尖锐性，在当代对生命之美、人性之美、善良之美、理想之美，唤起一种重新锻造的欲望，并使得文学之表达有了新的方法的探索任务。长诗是一种能够将诸传统体裁融入其中的“涵量”较大的体式，因此，也是可望能够将这些新时期涌现的元素与结构的新裂变，较精准与完整地吸收与消化化的体式。

现实已具备了长诗的庞大元素库。几十年的博弈中已涌现出一大批像焦裕禄、邓稼先、牛玉儒、杨建业、屠呦呦、杨利伟等英雄人物；像三峡大坝、长江大桥、高铁、航母工程、登月工程等一大批国家工程，还有希望工程、扶贫攻坚战、城镇化发展、“一带一路”构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都彰显出惠及人类的大格局意识。一段历史就是一曲长歌，一个楷模就

副县长，但因为是挂职，没有实质的分工，其实是极边缘化的角色。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我真切地进入生活现场。我回到西部的自然之中，回到乡村这一我人生的底色，在田间地头

是，诗就在生活里，等待我们去寻找。我的体会是，日常生活固然是体验，但生活真远比日常生活丰富。尤其在新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是我们始料不及的，甚至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为此，我们只有向下再向下之后，才有可能上升再上升。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说过：“我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的时代，需要用诗歌去拥抱新时代、见证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这就要求诗人们将个体生命经验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去，找到更好的交汇点。”他的长诗《大河》和《我，雪豹……》给我的印象相当深刻。大河即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诗人在向黄河致敬，也在整理自己的文化和情感。而《我，雪豹……》则是诗人回到内心，以歌咏英雄和新时代图景的方式，爬梳自身的精神谱系。向上掀起精神高度，向下膜拜似大地一样厚重的历史文化，向内倾听灵魂本真且纯粹的呼吸。他在唤醒沉睡的文化，重拾古典审美，挑亮黑暗中的灯光，自信地走在新时代的大路上。是的，“拥抱”是首要的，只有拥抱，才能感受到新时代的温度，才会有血脉相连的体察。新时代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具写的生活状态。如果我们把新时代真正地当作我们生活的家，才能让新诗常新，我们的诗才会有“亲切之感、真切之暖、诗性之力”。

与诗歌一起回家，就是要回到诗歌的新时代审美。我们谈论诗歌时，不能离开诗歌的疆域，不能离家出走。诗之所以为诗，总有诗所独有的审美范式和品质。新时代的中国诗歌，是新时代的审美，是中国的审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这是我们诗歌的精神家园和灵魂所在。新诗在成长阶段，接受多文化的熏陶是必须的，但这样的熏陶，只有充分内化，才可能有益于成长。事实证明，只有外在形式的模仿和他者精神的生吞，而不顾我们自身的文化，写不出属于我们自己的诗，写不出具有强

我认同李少君关于建构新时代诗歌主体性的主张。“现代性最主要的概念就是主体性，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后发现现代化的国家，1949年新中国成立，恢复了其主体性，但走向全面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需要艰苦的努力和扎实的建设。新诗也是如此，我们要克服西方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逻辑，尤其是主客割裂对立的思维，中国传统强调天人合一，民胞物与，主客合一，在文学上诗歌上，就是强调人民性和主体性的结合，这样的诗歌道路，才是中国诗歌的现代性方向。”在这里，李少君的主张十分鲜明，阐述精确而深刻。读李少君的诗，常常会以为在观摩一幅幅中国画，时而工笔精绘，时而写意飞翔。他以文字映射一个个画面，便有了意味，诗就成了“有意味的诗”。个性化的画面感，营造了个性化的情境，继而形成富有质地的意境，诗意自然荡漾开来。这样的诗，如果读者积极进入其中，主动性地阅读，便能读出美，悟出某些哲理。传统性、本土文化性的深植，领受现代性的诗学，这应该是中国当代诗发展的主要路径。李少君正是这样一位在坚守中不断前行的诗人，且不断地收获着。

回家，是为了内聚精气神，爱我们这个时代。当然内心对时代充满爱，对人生充满敬重，我们的诗才会有光芒。

回家，是为了守正，是为了再出发。丢掉中国文化的意境，极端地强调新诗的“新”是机械式的外来，我们将会穷途末路，这已经是许多诗人的共识。

回家，是从肉身的漂泊和精神的恍惚中回到坚实的大地，回到新时代的生活里，把书写新时代的精神作为人生和诗歌的共同理想。

是一面旗帜，一座丰碑就是一道荡气回肠、站立的长诗。以长诗抒写这些历史，将是新诗在一定程度上从时代边缘回到时代话语中心的一种策略与任务。

二、文学本土性文化叙述的确认和挖掘需求对长诗的呼唤。

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诗歌传统美学，是本土性的惟一要素。本土性也包含地域性和民族性。藏族诗歌有禅性，蒙古族诗有雄浑之风，陕北晋地诗有民歌之风，汉族及其他民族有田园性等。因此，中国现实、中国经验、中国故事，乃至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本土性”，形成了写作的参照系，不容置疑。

我们的长诗，有它自身的气场和审美趋向。这个气场是中国型的，它的审美趋向必须是站在中国诗歌的基础上，说中国话、写中国诗。为中国诗史储备更多的长诗，这在未来看，既是民族精神财产的一个主轴线的显现，也是文化考古的重要依据。基于此，又要求这种本土性的确认对象是更精细、更丰富、更准确真实的，这就呼唤更多的诗人来参与这种国家与民族工程性的文化奠基，也就是进行长诗创作。

三、长诗本身的变革：在变中站稳脚跟，开拓与创新长诗的新形式的需求。

社会在变，读者在变，语言习俗也在变，知识结构、审美向度，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诗不再扼守“琅琅上口”“妇孺皆宜”“有头有尾”的旧约，诗人们破浪而行，向感悟时空突进、向语言极致突进、向文本自身突进，正创造着一种全新的“中国体”。

就长诗的传统架构、语言修辞手法、意象意境的拓展，都有改进、跟进的可能。长诗是诗，并且仍然是浓缩了的结晶体。而不是循规蹈矩地复述历史，它不是用数字、年月铺陈历史，它是用诗人的智慧、语言的灵动、意境的神性再现历史。它是暴风雨雨后的宁静眺望，它是一场战争结束后的清点和掩埋，它是劫难之后的祈祷和忠告。

对于西方的诗歌传统，一味效仿是不行的。借鉴其精华为我所用，才是明智的选择。让本土性溶入血液，支撑主题、语言与意境。写历史没有隔膜感、写今天没有陈旧感、写情节没有冗赘感，追求长诗的大气、厚重、庄严、高妙，以及别具风范的全新品格，是我们的愿景。

